

中國古代
籍帳研究

〔日〕池田溫 著
龔澤銑 譯

中國正午集

龔澤銑譯

局

〔目〕池田溫著
龔澤銑譯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崔文印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日〕池田溫著

龔澤銑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⁵/₄印張·270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冊

統一書號：11018·1228 定價：1.40元

譯者序言

關於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按歷史順序論述的著作，在國內有如麟角。

近讀日本池田溫先生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其內容上自商周下迄隋唐，取材精賅，體系整然。尤以引用大量的中國古籍文獻、敦煌、吐魯番文書及地下發掘文物等等作爲佐證，論述多有獨到之處，洵爲一部精心專著。特爲譯出概觀部分，至其錄文部分因全係資料及插圖故從略，或可爲促進中日學術交流之一助。

池田先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專攻中國史學，乃新派學者中之佼佼者，其論著多未有漢譯。

從向來中日文化關係看，兩國人民之間具有甚深的因緣，在世界文化關係中最奇特的例子，中日確是其一。日本古代的文字學藝以至政治制度幾乎全以中國文化爲基本，甚至中國的文物和習俗，日本直接保存至今的亦復不少，而且留有唐代遺風，這并非誇張之言。另一方面，近代以還，日本對於中國文化學術的研究也很發達，頗令明達的中國學者有感到壓迫之歎。那麼，在日本的中國古代文化資料及其研究成績也就不能忽然置之，有時實在還須積極的加以注意纔對；所以，時至今日，文化學術上的聯繫與考索是更應該着重的。

日本歷來關於中國的研究大抵可以分作兩大類，其一是探討中國學術者的工作，其二是所謂中國通的工作。具體一點說，其一是爲學術的，目的在於求知；其二則是爲實用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且不去提它；而吾人對於日本只可說是一知半解，瞠乎其後，然而知己知彼却是同樣的切要。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一切向中國求教，維新以後，轉而學習西方，大有成效。近代吾人又向日本學習，所謂「明治櫛窗」，一時欣羨求索者接踵東渡，吸取新知，從此相互交流攻錯，日益密切。數十年來，其它姑勿論，僅就日本學者專心致志於學術研究這一點說，可資借鑑者實多。

譯者不敏，譯文竊劣，謬誤難免，未能爲原著增色，只不過聊作獻芹耳。但求能藉拙譯的介紹，有裨益於中國學術界則幸甚矣。

關於原著的錄文及插圖部分，特摘錄其目次索引附於書後，以供讀者查閱參考。

拙譯承池田溫先生爲惠撰序言，特此致謝！

又蒙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負責諸先生同意翻譯刊行，以及劉曼春君協助商洽出版，一併致以謝意！

龔澤銑識於蘭州

一九八二年四月三十日

著者序言

這次幸賴西北師範學院龔澤銑先生不辭辛勞，譯出拙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一書的中文本，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欣慰之餘，深有所感。

在東亞，中國是最早開放文明燦爛之花的古國，隔海相望的日本，受其先進文明的影響，約遲了两千年纔形成國家，在攝取隋唐的文物制度之後，而使自己的法制和文化得到發達。看一看近代以前的日本的歷史文化，中國的影響無論在任何領域，直接間接都很顯著。

東海的島國日本，遭受外敵入侵的情形極少，國內的社會變動也比較小，因此，古代以來，在寺院、神社和公卿、大名等的故家中，往昔的文化遺物和文書遺存得很多。如在奈良的東大寺正倉院，就保存有八世紀的文書類（正倉院文書）約一萬件，其中包括着大寶二年（公元七〇二年）御野國、筑前國等的戶籍和養老五年（公元七二一年）下總國戶籍、神龜三年（公元七二六年）山背國計帳歷名、天平五年（公元七三三年）右京計帳手實等等，這些即便在日本的古文書中，也是屬於最古的一類，而特別受到重視。二十世紀初，《大日本古文書（編年文書）》以活字版刊行以來，由此纔得以探討日本古代家族的實際狀況，及其進而通過鄉里制度以掌握人民的實情，而歸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吾人對於中國敦煌和吐魯番所發現，以唐代爲主的古代戶籍類，寄與殷切的關心者，首先是在其中發現日本正倉

院籍帳的直接的模式。

同時，甚至於可在其社會經濟的基礎中，深究中國的歷史，以期得知近乎戶口和田土所有或者公課徵收與勞役差發的實情，對此說來，敦煌等處的籍帳殘卷乃是極為重要的根本史料。以整體看，遺存籍帳的地域局限於西陲，又在作統計研究時，雖然每每因數量的貧乏感到困難，但拙著之所以取古代籍帳為對象而試作概論和分析，也無非是因認定了其資料價值的重要性。

幸而在從吐魯番盆地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羣中所發掘出來的古文書（現以唐長孺教授為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全十冊正刊行中，關於唐代籍帳類收錄於其第四冊以下諸冊）中，唐代的籍帳類有相當多的數量，今後期待着新資料的發現，可能使將來的研究更加得到充實吧。

拙著刊行後，欣得礪波護（東洋史研究三九——一，一九八〇年）、菊池英夫（社會經濟史學四六——二，一九八〇年）、佐竹靖彥（史學雜誌九〇——七，一九八一年）諸氏懇切的批評，特別是佐竹氏訂正了拙著不完備和錯誤之點不少。又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亦訂正了關於吐魯番文書的錄文多數的誤漏，一九八一年末，本人訪問該研究室時親蒙指教。希望以後再版時盡可能地採用這些訂補，曾將正誤表寄與譯者龔先生，在譯本中，可能已訂正了拙著的若干錯誤。

在中國，注意於古代籍帳的研究者也很多，特別是宋家鉅氏的「唐代的手實、戶籍與計帳」（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六）中，在充分利用了日本的史料之後，關於唐制與日本的制度之差異，也提出了批判拙著論述的見解，於今後研究的深化與以有益的啟示。在促進這方面的研究，譯本如能有一點裨

益，則是極感欣慰的。

聯想起來，一九七九年拙著刊行後，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寄贈甘肅師範大學（現名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一本時，該系陳守忠先生曾惠賜華翰云：

我系研究隋唐史的同志，苦於唐代籍帳材料之缺乏，正托人在北京圖書館拍製膠卷，而恰在此時，貴所這部巨著寄到，真可謂雪中送炭，我們非常高興，至於池田先生論述，我們正着手翻譯。

這是多麼令人銘記難忘的一封信。對於距離作為拙著之研究對象的籍帳當地很近的蘭州的史學工作者，將存在國外的資料，以易解的狀況提供出來，如果在促進其研究工作上有用的話，則誠然不能不說是拙著有其刊行的效果。

此外，一九八〇年九月，本人參加了以秋山光和先生為團長的訪華團，於參觀敦煌莫高窟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史華湘先生特意以流暢筆法揮毫題詩一首，相贈作為紀念：

殘篇斷簡理遺書，

隋唐盛業眼底浮，

徘徊窟中意無限，

籍帳男女呼欲出。

遠離日本數千公里之遙，位於東亞內陸乾燥地帶的綠洲都市敦煌，無論如何也是難以到達的絕

域，所謂非探險家不能去的地方，曾經是一種常識，但此次却容易地親臨該處，得以接觸前人的文化遺產，這真是夢境般的幸福。其所以成爲可能者，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文化行政的進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爲首多數熱情協助者的努力，石窟的修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還有日中友好關係得到確立，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日益加深之故。所以時至今日，訪問敦煌和吐魯番的日本人何止千百，今後也還會更增加吧。來到石窟中藏經洞內，得見到偶存的籍帳殘卷中所有的男男女女，莫不令人有非常親切之感。

譯者龔先生，據聞戰前曾留學東京大學，受業於中村孝也教授等諸先生。這樣看來，東京大學與西北師範學院的因緣原屬不淺。以拙著的譯出爲契機，日中兩國史學工作者的聯繫將更其密切，衷心祝願能成爲今後兩國友好關係世代發展下去之一助。

此外，佔拙著過半的錄文部分，因印刷技術上的關係，不包括在譯本之中，但對於拙著的利用者而言，缺少錄文無疑是多有不便。期待將來用某種方式以解決這一困難。

今當譯書完成之際，譯者龔先生固不待言，對於曾經給與大力協助的陳守忠先生和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諸位，以及爲實現譯書的刊行予以好意照顧的東京大學當局和東洋文化研究所中根千枝與大野盛雄新舊兩所長，亦一併特表感謝。

池田溫

一九八二年五月於東京

目次

譯者序言

著者序言

序

序章

一 中國史的特徵與籍帳…………… 九

二 古代籍帳的發現與研究…………… 一八

第一章 古代籍帳制度的形成…………… 三九

一 籍帳的源流…………… 三九

二 戰國・秦代的戶籍…………… 四七

三 漢代的簿籍…………… 六〇

第二章 古代籍帳制度的變質…………… 七九

一 魏晉南朝的戶籍…………… 七九

戶籍與身分制…………… 八〇

戶籍的巧偽	八四
十六國時代的戶籍	九四
三 北朝時代的籍帳	一〇一
三長制與造籍	一〇三
西魏的籍帳(文書的外形與稱呼 戶口與二長 公課與田土 文書的背景)	一〇五
東魏・北齊的籍帳	一四三
第三章 古代籍帳制度的完成與崩潰	一五七
一 隋代籍帳的完備	一五七
二 唐代的造籍	一六五
造籍規定	一六六
手實與手實計帳	一六九
戶籍的外形與書式	一七四
貌定與定戶	一八〇
造籍年次	一九〇
特別身分籍	一九一
計帳	一九三

三	開元敦煌籍中所出現的檢括的痕跡	二二六
	武周・開元初年籍帳的鬆弛	二二七
	開元十年《籍》草稿中所見到的檢括和徵兵	二二三
	見於開元四年籍抄錄中的檢括	二二六
	宇文融括戶政策的一面	二四一
四	天寶敦煌籍中所出現的僞濫傾向	二四九
	每戶口數的增大	二五〇
	男女數的不均衡	二五八
	僞籍的原因	二六四
五	敦煌差科簿的變遷——丁中掌握的鬆弛	二七五
	差科簿研究史	二七六
	文書原形	二七九
	文書的年代	二八三
	差科簿的登錄對象	二八五
	破除與見在	二九〇
	差科簿的編製手續	二九四

年齡分佈與老小登簿	二九七
差科簿中出現的鄉閭的差異	三〇二
差科的特質	三〇五
大曆差科簿的形骸化	三一七
安史亂後籍帳的荒廢傾向——以大曆四年敦煌手實為線索	三二七
大曆手實的外形	三二八
登載戶口的激減	三三一
田土登錄的名目化	三四四
與全國統計的關聯	三四七

錄文目次	三六一
插圖目次	三八三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池田溫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

序

被稱爲歷史之國的中國，在以二十四史爲首的豐富史籍中，從二千年前的漢代以來，經由歷代王朝的戶籍制度所記錄的戶口統計，一直保留至今。這是世界各國無與倫比的一種傳統，它顯示着舊中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是怎樣把這個龐大帝國統治下來的一個倔強的標誌。

當然，把記錄在《漢書》地理志以下各古籍中的戶數和口數的統計數字，單純地作爲人口學的數據來處理，並非活用資料之道，因爲若把統計數字的增減照原樣地認爲是實際狀態，那就會陷入危險的泥坑之中。但是，根據這些統計，對於雄辯地說明每個王朝勢力消長的標誌，當然能够推測得出來；同時對於各個不同的歷史背景，如果予以慎重的關注，即便是作爲間接的人口學資料，也是可以利用的。

通過郡縣鄉里掌握其戶口，這是帝國存立的絕對必要的基礎，所以造籍制度是國家體制最緊要的一環；同時，對於被統治的人民說來，戶籍登錄不外是使他們慘遭租稅和徭役種種壓榨的第一步。

以每一個丁男爲對象的公課徵收與授田，從定爲國制的基本的北朝後期起直至隋唐前期這一時期，籍帳所起的作用被認爲是特別重大的。通過當時籍帳原有的狀況去探索舊中國統治的特點，這是史學界面臨的一個大課題。

籍帳研究，當然必須以舊存的文獻和新發現的斷簡殘編二者作綜合的考察。從《周官》或正史的志書以及《通典》以下的政書中摘錄其有關的記事，這是研究昔日制度史通常所採取的辦法。關於舊中國的戶籍，在《臺灣私法》和《清國行政法》之中，已由織田萬、狩野直喜、加藤繁諸氏大體作爲通史的概觀給予敘述過。又如以「戶令」、「戶部格」、「戶部式」等有關的法律條文爲主的法制史料的分析研究，可以說，幸賴仁井田陞先生之手，給予了基本的啓示。

從來，無論是誰，通過具有被忽略傾向的文學作品，也可能看出當時人們對於籍帳有其關心的一面。例如當出任官吏的時候，必須參加身、言、書、判四種考試的當時官員們，在用作練習範例的判集之中，涉及與戶籍有關的案件也屢屢被提了出來。在張鷟的《龍筋鳳髓判》中，就曾揭露出這樣的問題：「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落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諸使皆言春疫死實多，非故爲疏漏」云（卷一戶部）。又如在敦煌藏書的《判集》中，也記有因戰亂而離散了的母子二人，戶籍合併爲一的問題。這些都是唐朝前期的例子，至於後期的判文中，如大比判、造帳籍判、登夫家判、書齒判、兩貫判、移貫判、移鄉判、徙鄉判、樂土判、附貫五年復訖判、戶絕判等二十餘篇，均收錄在《文苑英華》中（卷五二九），可知實際試判解答的情況。這些判文，除了敦煌所藏者少數可作爲例

外，其他幾乎都是寫成駢儷的短文，對於現實問題缺乏切實的氣魄，如實地反映出當時一班官吏輕實務而重古典教養的性格。

至於以超脫世俗的詩人而著名的寒山，回顧了自己的半生歷程之後，也曾詠出這樣的詩句：「泊老檢黃籍，依前住白丁」（《寒山子詩集》）。對於一班下級官吏說來，戶籍的登記和檢查則是他們最普通的日常工作。在題名為侯白的《啓顏錄》笑話集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太平廣記》卷二五二）。像這樣昧於吏治的官吏被掌管文牘的下屬們所愚弄的情況頗多，實際妨礙造籍造簿者，就是屬於流外和雜役的那班下級人員。

開元年間，制策及第的陳章甫，因戶部核對戶籍曾被誤記，其身分未得確認而喪失了資格時，給擔任吏部員外郎孫氏寫的書信，被視為名文而流傳下來（見《封氏聞見錄》卷三制科及《唐文粹》卷八九）。章甫列舉昔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天下；張良為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之為相諸例證，並進而強調說：「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為？……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云云。結果吏部特轉詣執政者裁奪，遂得以合格錄用，一時傳為美談。這樣看來，官僚階層這班人，如果意識到戶

籍登錄原是爲了統治一般人民，自己能置之度外而無所顧忌，即便無視法規，也得選拔賢才，這纔是此輩值得欽佩的高尚品德。通過上述數例，也可以看出曾經寫下許多著作的文人官僚們，對於籍帳所持的態度表裏不一吧。

歸根到底，通過這些文獻的敘述，雖然可以認識制度的外延與概念，但要探求籍帳的實際情形及其應用的具體狀況，却有很大的局限。本世紀在中國西陲的敦煌和吐魯番所發現的文書資料，對於中國史的研究，給予了劃時期的貢獻，現在這是學術界所周知的事情。特別是包括有關戶口、公課、田土的各戶記事的籍帳類，乃是最能直接說明當時人民生活的實際情況和政府統治的意圖的一種基本資料。因此，以經過半個世紀的唐朝前期爲中心時代的公課制、兵制、田制開始，進而開展對於法制及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有賴於新發現的籍帳類的分析利用之處很大。

但是，敦煌和吐魯番的文書，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各探險隊的侵入，多被各國盜走，分藏在遠離中國的幾個地方，至今未曾進行整理編目工作，妨礙了對它們的利用有數十年之久，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好在由於二十年來顯微攝影器的普及，使這些文書資料的研究條件得到了顯著的改善。特別是幸賴日本前輩學者的努力，關於籍帳的情況，纔有可能大體窺知其全貌。同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所有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也有了驚人的進展。諸如戰國秦漢以來的竹木簡和六朝隋唐時期的文書新資料，都陸續有所發現，從而使秦漢的籍帳以及經高昌國至唐代的吐魯番地區的籍帳資料，顯著增加起來。吾人殷切期待今後同類的材料更多地發掘出來，在最近的將來，根據文書一類的第一手史料而